

当秘书告诉他，新西兰作家汤姆·牛纳姆请他为凯瑟琳·霍尔题词时，久病初愈的聂荣臻没有半点儿犹豫，挥毫写下“救死扶伤，英勇献身，支持抗战，青史永存”——纪念新西兰友人凯瑟琳·霍尔女士的题词。

白求恩称她为“我们八路军中的战地天使”，两人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情谊。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。但许多珍贵的史料告诉我们：

凯瑟琳对白求恩在精神上有着深深的依恋和怀念，她忘不了白求恩期待的眼神，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胆量，她欣赏他的精湛医术和幽默谈吐。白求恩告诉她：“当你听着近在咫尺的枪炮声抢救伤员时，你才能亲身体会到战斗的奇异和崇高。”她有些崇拜地看着白求恩，告诉他：“找个时间，我把运输药品的经历也讲给你听。”这一次次愉快的交谈使她终生难忘。而白求恩同样对她怀有一种圣洁的情感。在他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，最后一句写道：“感谢凯瑟琳·霍尔对我的帮助。”

霍尔是个坚强的女性，很少流泪。从她的记述和有关史料中我们看到她为白求恩多次流泪。一次是她被日军驱逐至香港后，向宋庆龄汇报八路军缺医少药，并和白求恩失去联系时，她默默地流下泪水。还有一次是她在贵阳听到白求恩去



上图：1960年，凯瑟琳·霍尔到中国参加国庆庆典。

世消息时泪水夺眶而出，她写道：“就在我们离开贵阳之前，传来了白求恩大夫去世的噩耗，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。我想到此时北方的人们会多么悲伤。我们到得太晚了，没能救活他。我要把这些药品尽快送到北方部队和游击队手中，正是为了这些人，白求恩大夫献出了宝贵生命。”另一次是她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一张不规则纸片上写下的一段回忆文字：“当《手术刀就是武器》这本书送到手里时，我声泪俱下，因为我担心我没能返回，他会感到失望。但这本书告诉我，他是知道我非常心甘情愿抛弃他的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可以想起最后一次他目送我下山时的情景。他看上去很瘦，很疲惫，但仍然带着惯常的微笑同我再见，不想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”

1954年，泰德·阿兰和塞德奈·戈登著《手术刀就是武器——白求恩

传》中对白求恩与她的描写，来自董越千向《白求恩大夫》一书作者周而复的介绍，并得到她的认可。第四次流泪，则是1964年凯瑟琳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，为白求恩扫墓。在华北烈士陵园，她捧起白求恩墓园中的黑土，放到一方洁白的手帕里包好。她流着泪告诉白求恩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，有了这包黑土，我会经常想起你的。”

永远留在了中国

新中国成立后，凯瑟琳曾于1958年，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20周年前夕，应宋庆龄之邀写下《对艰苦奋斗日子的回忆》一文，再次表达了她对“乡村中千百万贫穷百姓健康的关心”。1960年国庆节，她随新西兰昌德勒主教访问中国并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，受到周恩来、宋庆龄、聂荣臻的会见，并在节后重访石家庄、安国等地。1964年，亦即为白求恩扫墓这一次，凯瑟琳是以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执委的身份来中国访问。

1970年4月3日，凯瑟琳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，享年74岁。她的葬礼在汉密尔顿圣公会大教堂举行，几乎所有熟悉她、仰慕她的新西兰人，从四面八方赶来与她告别。根据她生前遗嘱，1993年9月，凯瑟琳的骨灰由她的亲友专程护送到曲阳县，一部分葬于烈士陵园，一部分撒在莲花山上。其实，她的这个心愿，早在宋家庄设立诊所时就和乡亲们讲过。她，终于永远留在了中国。（作者系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）

凯瑟琳对日军暴行深恶痛绝，对中国的抗战冒险相助。每当日军大扫荡时，她就会在宋家庄诊所挂起英国国旗，掩护来不及转移的八路军伤员和妇女儿童。